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8.05.001

再论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

乔全生, 刘 洋

(山西大学 语言科学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晋语语音研究自高本汉研究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晋方言语音研究成果除为学界提供丰富的语音材料、引领汉语方言语音史的发展方向、挖掘出北方官话语音史的若干细节外,文章又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一、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关键的文献依据;二、晋语语音史研究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音变线索;三、晋语语音史研究为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方法论依据。

关键词: 晋语;语音研究;汉语音韵学;新二重证据法

中图分类号: H1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18)05-0001-06

本文是《论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1]的续篇。上文提出,近百年来的晋语语音研究不仅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语音材料,而且引领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挖掘出北方官话的若干细节。我们将在上文基础上继续挖掘、探讨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本文提出晋语语音研究的实践不仅为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文献依据和重要的音变线索,而且提供了可贵的方法论依据。下面逐一论述。

一 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关键的文献依据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语音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如钱乃荣(2003)《上海语言发展史》^[2]、乔全生(2008)《晋方言语音史研究》^[3]、刘晓南(2012)《宋代四川语音研究》^[4]等。汉语语音史研究与地方文献相互印证、相辅相成。一方面汉语语音史研究促进地方方言文献的挖掘和研究,另一方面地方方言文献资料也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与东南部方言丰富的文献资料相比,记录晋语的文献资料较少,尤其是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记载晋语语音的韵书更少。可贵的是,百年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首开晋语

语音研究的先河,其《中国音韵学研究》之第四卷“方言字汇”中,包含22个点的汉语方音,其中,调查记录了今晋语区的太原、大同、太谷、文水、兴县、凤台(今晋城)、归化(今呼和浩特)和怀庆共8个点的方言字音,成为晋语百年演变史的重要文献。高氏的记音注重文白异读、古今语音的对比和语音演变规律的分析。他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记录了晋语语音的诸多重要特征,如表1、表2、下页表3文水方言中的元音高化现象^{[5]547-689}。

据表1、2可知,文水方言果摄主要元音[ɯ]高于太原、大同的主要元音[o]或[ə];宕江摄主要元音[u]高于太原、大同的主要元音[a]或[ɔ]。

表1 20世纪初晋方言果摄字读音举例

	端系			见系		精系			
	多	驼	罗	左	磋	歌	可	蛾	何
文水	tɯ	t'ɯ	lɯ		ts'ɯ	kw	k'ɯ	ŋw	xw
太原	to	t'o	lo	tso	ts'o	kə	k'ə	ŋə	xə
大同	to	t'o	lo	tso	ts'o	ko	k'o	ŋo	xo

表2 20世纪初晋方言宕江摄字读音举例

	帮组				知系				
	榜	傍	旁	房	张	丈	床	畅	尚
文水	pu	pu	p'u	xu	tʂu	tʂu	ts'u	tʂ'u	ʂu
太原	pa		p'a	fa	tʂa	tʂa	ts'ua	ts'a	sa
大同	pɔ		p'ɔ	fɔ	tʂɔ	tʂɔ	ts'uo	tʂ'ɔ	ʂɔ

收稿日期:2018-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10&ZD122);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人20131号);三晋学者奖励计划(晋教研201212号);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晋教科201210号)

作者简介:乔全生(1956-),男,山西临汾人,博士,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三晋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学、汉语语音史研究。

据表3可知,自20世纪初至今,文水方言果摄字主要元音继续向前演变,并发生裂化,即由原来的主要元音[ɔ]裂化为[ɿ]。

表3 文水方言果摄与宕江摄古今对比
(“/”前为白读,“/”后为文读)

	果摄				宕江摄			
	歌	可	过	火	长	枪	荒	王
古	kɔ	k'ɔ	kɔɔ	uɔ	tɕ' u	tɕ' yu	xu	u
今	kɿ	k'ɿ	kɿɿ	xɿɿ	tsu	tɕ' yu/tɕ' iaŋ	xu/xuaŋ	u/uɑŋ

乔全生(2009)指出,元音高化是文水方言百年来音系结构演变的主要表现,元音高化后可能继续高化,果摄等后高元音的裂化是继续高化的特殊形式之一^[6]。从高本汉的记录到今天我们对文水方言的调查,使我们对文水方言的元音高化现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除文水外,太原、大同也出现了元音高化现象,由此可知,晋语是元音高化突出的方言,文水方言是晋语元音高化现象的一个缩影。文水方言元音高化现象揭示了汉语方言元音高化的演变模式,丰富了汉语方言的音韵体系。

继高本汉(1915—1926)之后,刘文炳(1939)对徐沟(今太原清徐)方言音系展开系统调查,著成《徐沟县语言志》(三册),成为了解早期晋语语音面貌的珍贵文献。乔全生(2008)^[3]在对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中特别重视文献的挖掘,部分资料首次用于晋语语音史研究,所引中外文献资料总计达三百余种,其中包括山西通志、地方志、山西文士杂记的方音记载、韵书、地方戏曲、民歌韵文等材料。此外,还充分运用了丰富的域外对音资料的研究成果,包括汉藏对音、梵汉对音、西夏汉对音、回鹘汉对音的研究成果。汉藏对音、梵汉对音材料是构拟唐五代时期晋方言语音的重要依据;西夏汉注音材料《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7]是研究西北方音、晋语尤其是中原官话汾河片的宝贵材料;回鹘汉文对音材料也是研究晋语语音史的重要资料。对晋语语音文献资料的深度挖掘、广泛收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晋语语音史的研究,也丰富了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晋语并州片、张呼片北部和东北部及上党片东南部等地区存在平声不分阴阳的现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晋语平声不分阴阳是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后分化为阴阳平的又一种合并,叫“回头演变”;另一种观点认为晋语的平声不分阴阳是滞古的表现形式。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声母的清浊影响声调的分化,但声调的分化并不以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为必要条件。王临惠

(2003)认为晋语平声不分阴阳的现象是滞后的,它是在声母的清浊对调值的影响还未达到影响调类分化的归并时就因全浊声母的清化而中断的结果,连读变调中能区分阴阳平正是中断的表现形式。^{[8]96-103}乔全生(2008)进一步指出晋语平声单字调不分阴阳的时间下限可上溯至17世纪初,平声的分化并不以浊声母的消失为必要条件,声母的清浊与声调的分化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受时空条件的制约,晋语并州片平声不分阴阳是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其他地区平声的演变也要结合该方言自身的历史条件加以考察。^{[3]248-253}其后,王为民发现《芸香斋韵法新谱》^[9]这一重要文献,该书记载了山西阳城方言在清代时期平声不分阴阳,在浊声母早已消失的情况下,阳城方言的平声并不分阴阳,今天的晋城方言由于受官话影响才区分阴阳。这一现象有力地印证了乔全生的上述观点。晋语平声不分阴阳的现状证实了古声母清浊与调类分化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充分说明挖掘历史文献对解释方言语音演变的关键作用,也充分说明,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关键的文献依据。

二 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音变线索

20世纪80年代,掀起晋语语音研究的热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调查研究工作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研究计划,先后出版了大同、清徐、怀仁、天镇、左云、新绛等《山西方言志丛书》43本。本套丛书体例一致,内容包括概说、语音系统描写、同音字表、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分类词表、语法例句等。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由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报告》^[10]问世。该报告对晋语进行了全面描写,将晋语语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其后进一步研究山西方言奠定坚实的基础。90年代至今,由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截至2016年先后出版了8辑50部。该丛书以《洪洞方言研究》^[11]为蓝本,体例包括区域概况、历史音韵、语音描写、词汇研究、语法调查和口头文化等,调查点涉及:洪洞、平鲁、武乡^{以上第一辑},河津、太原北郊区、太原城区^{以上第二辑},代县、静乐、娄烦、高平^{以上第三辑},晋源、山阴、榆社、长治县、应县^{以上第四辑},汾西、平陆、五台、浮山、大宁、孟县、浑源、永和^{以上第五辑},晋城及泽州、阳城、绛县、左权、壶关、右玉、朔城区^{以上第六辑},交城、清徐、吉县、古县、平定、兴县、原平、霍州^{以上第七辑},襄汾、阳高、汾阳、灵石、榆次、天镇、运

城盐湖区、安泽、闻喜和永济^{以上第八辑}。这是山西省内开展单点方言研究较大规模集成的重要成果,全面记录了各调查点的方言面貌,使晋语语音的平面描写达到更高层次,为晋语语音史研究、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众多重要的音变线索。自2015年起,以乔全生教授为核心专家的晋语调查团队连续三年承担“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西汉语方言调查”项目,总计调查43个市县区镇的单字、词汇、语法、口头文化等语料。这些调查点几乎遍及全省,分别为:大同县、左云、广灵、灵丘^{以上属大同市},怀仁^{属朔州市},忻州、繁峙、定襄、河曲、五寨、偏关、宁武、神池^{以上属忻州市},太原市小店区、阳曲^{以上属太原市},离石、柳林、中阳、隰县、文水、孝义^{以上属吕梁市},寿阳、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昔阳^{以上属晋中市},临汾市尧都区、乡宁、赵城、翼城^{以上属临汾市},垣曲、稷山、新绛、芮城、临猗高密话^{以上属运城市},长治市区、沁县、沁源、平顺、长子、沁源法中乡河南话^{以上属长治市},陵川^{属晋城市}。连同《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中调查过的县市区共90个方言点,已占山西省119个县市区的75%。这些调查材料均是研究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基础材料,仔细分析、对比,可以发现众多的音变线索。

比如,我们在调查山西长治方言点时,发现长治方言市区、城区和郊区的老、中、青三派的声、韵、调在悄然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演变,其音变线索是:长治方言古日母字[ʎ]、[∅]声母消失,[ʒ]声母出现,市区新派古日母字已全部读[ʒ]声母,这一演变方式不与同一层级的其他音位处于同一聚合群。调查山西五台片繁峙方言时也发现这一现象,即古日母字读[ʒ]声母,不与舌尖前音[ts、ts'、s]相匹配。这一现象与此前我们调查过的并州片太原方言截然不同,太原方言古日母字全部读为[ʒ]声母,与[ts、ts'、s]构成一组完整的聚合群。语音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徐通锵(2008)指出,平行、对称是音位系统的重要特点,某一语音系统中,处于单向对立中的音位通常有两种演变方向:其一是失去自己的区别特征并入其他音位,从而使单向对立的情况消失;其二是促使其他音位进行调整,产生新的、能与之配对的音位,从而建立新的双向对立。^{[12]174-181}繁峙方言[s]声母的出现实现了与[ʒ]声母的双向对立,[s]为清音声母,[ʒ]为浊音声母,这样清浊对立,促成了语音系统新的平衡。长治方言古日母字未与[ts、ts'、s]声母相配读为[ʒ]声母,而是读为[ʒ]声母。这一音变线索揭示了古日母字在山西方言中的特殊演变路径,也映射出古日母字在汉语方言语音史上的另一

种走向。

在调查晋方言语音时,发现有的方言点存在一种特殊的韵母变化形式,即来自同一古韵摄的字,由于调类不同,而韵母有所区别。这种调类影响韵母音值的现象在山西襄垣、隰县、永济等方言中都有发现。金有景(1985)提出襄垣方言效摄、蟹摄一二等字声调影响韵母分类的现象尤为突出^[13]。据王利(2008)调查,效摄字逢今阴平、阳平和去声读[au iau]韵母,逢今上声时读[aŋ iaŋ]韵母,与宕江摄合流,如“刀[_ctau]、逃[_ct'au]、报[pau²];交[_ctɕiau]、肴[_ciau]、鲍[pau²]、考[^ck' aŋ]、表[^cpi aŋ]”等;蟹摄一二等字逢今阴平、阳平和去声读[ai]韵母,逢今上声时读[æ]韵母,与咸山摄合流,如“该[_ckai]、柴[_cts'ai]、在[tsai²]、买[^cmæ]、奶[^cnæ]、改[^ckæ]”。其中襄垣方言阴平、阳平和去声的调值分别为33、11和55,上声调值为213^{[14]263-268}。刘勋宁(1993)提出今山西隰县方言咸、山、宕^{文读}三摄舒声字韵尾也存在调值分韵的现象。逢今阳平和上声时,咸、山、宕^{文读}三摄舒声字韵母分别为[an ian uan yan],如“慢[man³⁴]、狼[lan³⁴]、连[lian³⁴]、凉[lian³⁴]、环[xuan³⁴]、黄[xuan³⁴]、悬[çyan³⁴]、染[z an²²]、嚷[z an²²]、眼[ŋian²²]、仰[ŋian²²]、短[tuan²²]、爽[ɕuan²²]”等;逢今阴平和去声时,咸、山、宕^{文读}三摄舒声字韵母分别为[ai iai uai yai],如“班[pai³¹²]、脏[tsai³¹²]、天[t'iai³¹²]、将[tɕiai³¹²]、端[tuai³¹²]、装[tɕuai³¹²]、旦[tai⁵²]、浪[lai⁵²]、练[liai⁵²]、降[tɕiai⁵²]、断[t'uai⁵²]、矿[k'uai⁵²]、劝[tɕ'uai⁵²]、院[yai⁵²]”等;隰县方言阳平、上声的调值分别为34、22,阴平、去声的调值分别为312、52^[15]。王晓婷在2017年调查隰县方言时也调查到此现象。不过,去声调值不是312,而是44,韵母记音已有所不同。是否三十年来的语音变化待考。永济方言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永济方言咸山撮逢阴平、阳平和上声时,以鼻化元音[æ̃ iæ̃ uæ̃ yæ̃]收尾,如“专[pfæ̃³¹]、颠[tiæ̃³¹]、廉[liæ̃²⁴]、甜[t' iæ̃²⁴]、短[tuæ̃⁵³]、管[kuæ̃⁵³]、选[çyæ̃⁵³]、冤[yæ̃³¹]”等;逢去声时,以复元音[ai iai uai yai]收尾,且舌位降低,拉大了发音的动程,如“串[pfhai⁴⁴]、栈[tɕai⁴⁴]、变[piai⁴⁴]、面[miai⁴⁴]、锻[tuai⁴⁴]、乱[luai⁴⁴]、眷[tɕyai⁴⁴]、院[yai⁴⁴]”等。永济方言阴平、阳平、上声调值分别为31、24和53,去声调值为44^{[16]34-44}。虽襄垣与隰县、永济三地方言均相距百里,呈三角状,但声调影响

韵母音值的语言事实却是一致的。曹志耘(2009)指出元音韵尾变为鼻辅音韵尾增加了韵母的长度,同一韵摄韵母的分化与曲折调直接相关,受曲折调(即长调)发音时长的影响,韵母的长度也随之加长^[17]。由此,襄垣、隰县方言均受长调的影响使韵母产生变异,然而永济方言的分韵现象是否受长调影响尚待研究。支建刚(2013)认为“调值跨度与时长没有必然的联系”^[18],提出调素、调位动态段等因素促使韵母产生相应的变化,但尚未对这一理论展开详细论述。无论如何,山西方言中的这种特殊的调值分韵现象已吸引了众多专家的关注和讨论。

在调查山西汾河片襄汾县汾城方言时,发现存在一种特殊的音节形式,我们称之为“紧喉音节”^[3134]。汾城方言中,来自古清声母的平声字以及少数来自非清声母的平声字多读为紧喉音节。据统计,除110个不常用的字外,《方言调查字表》所收纳的700个左右的清声母平声字汾城方言均读为紧喉音节。目前,国内外对紧喉音节的报道较少,国际音标尚无专门的符号来表示紧喉音节,为方便计,采用音节前加喉塞符号来表示紧喉音节,如“东[ʔuəŋ³²]、该[ʔkai³²]、灯[ʔtəŋ³²]、风[ʔfəŋ³²]、通[ʔthuəŋ³²]、开[ʔkhai³²]、天[ʔthiā³²]、春[ʔtshuei³²]、猪[ʔtʂu³²]、低[ʔti³²]”等。与喉塞尾韵不同,紧喉动作贯穿于整个音节,以紧喉开始,以紧喉结束;而喉塞尾韵只是发喉塞尾时喉部紧张,以松喉开始,以紧喉结束;且在语流中,紧喉音节不舒化,喉塞尾可能舒化。汾城方言的紧喉音节具有音位价值,它是一种通过发音的松紧来区别意义的非音质音位。相同调型的字,紧喉与不紧喉具有一定的辨义作用,如“喷 ʔp‘ei³²水 ≠ p‘ei⁵³水、晕 ʔyei³² ≠ yei⁵³、惊 ʔtɕiəŋ³² ≠ 京 tɕiəŋ³¹、聪 ʔts‘uəŋ³² ≠ 凶 ts‘uəŋ³¹、鹰 ʔiəŋ³² ≠ 应 iəŋ³¹、潘 ʔp‘āŋ³² ≠ 拼 p‘āŋ³¹、书 ʔʂu³² ≠ 舒 ʂu³¹”等^[31345]。因此,无论从语音的物理属性还是其社会属性而言,汾城方言的紧喉音节在汉语方言中都属于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这种语音现象有可能是一种古语言的“活化石”。马学良(1999)曾指出,王静如发现西夏语中可能存在紧喉音节,日本西田龙雄提出彝语等语言中也存在紧喉音节与非紧喉音节之间的对立^{[19]61-64}。结合汾河片方言中保留的西夏和宋西北方音的其他语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我们曾提出的“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音的延续”的重要观点。对汾城方言紧喉音节的揭示,是晋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发现,无疑为汉语音韵学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音变线索。

三 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为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方法论依据

语言学中最典型的方法论是19世纪盛行的“历史比较法”。该方法是研究语音演变史的最有效方法,它是以占有丰富的语音材料为前提。历史比较法以材料为基础又受限于材料,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材料的丰富性成正比。当历史比较法构拟原始母语遭遇困难时,历史层次法应运而生。但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确定历史层次的性质上,偏离了方言史研究的目的。乔全生(2014)指出“历史层次的研究应当而且必须放在方言史研究的框架之内,必须依靠历史文献,否则很容易陷入共时层面的陷阱”^[20]。目前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尚未处理好与方言史之间的关系。戴黎刚(2005)指出“历史层次分析法划分层次最重要的依据是音类的对立关系……要确定历史层次的年代,最好是有历史文献做依据”^[21]。汉语语音史是研究汉语各个历史时期语音面貌或语音系统的学问,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需要对汉语语音进行共时描写,又要与历史文献结合,在对共时材料描写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资料考证语音的演变。这是目前研究汉语音韵学应倡导的方法论。“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特点是‘冷’、‘难’、‘笨’、‘实’……所谓‘实’,‘从文献研究,是语音史研究的基石’”^[22]。关于文献资料的使用,王国维(1994)《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23],即用“地下材料”补证“传世文献”。鲁国尧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24]中即开始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通泰方言语音史,并将此概括为“新二重证据法”。其中,“历史文献考证法”中的“考证”就是“求是”,就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接近真理;“历史比较法”,即通过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多点的比较,佐证其亲属关系,最终探究原始母语。^[22,25]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最佳方法。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同时要结合汉语方言事实来印证,一方面需要对汉语方言进行平面细致的调查和描写,另一方面需要在调查描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乔全生(2008)《晋方言语音史研究》^[3]将晋语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文献相结合,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新二重证据法”研究晋语语音的历史,是对鲁国尧先生提倡的“新二重证

据法”的有效尝试和体现。该书旁征博引,广泛搜集并利用了自晚唐以来反映晋语语音历史的汉、藏、梵、西夏等对音材料的研究成果,及诗歌韵文、方志和地方戏曲等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充分挖掘当代晋方言的语音特点,始终贯穿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直系后裔,汾河片中原官话是宋西北方音的延续”的重要观点,从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证实了晋语与唐五代宋西北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从方法论角度看,《晋方言语音史研究》是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使用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新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范例。

2003年至2016年,乔全生先后发表了《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26,27,28,29]系列文章,其中,“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系列(一)(二)主要写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中晋语演变滞后的一面,即晋语的“存古性”;“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系列(三)(四)主要写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中晋语演变超前的一面,即晋语的“创新性”。受人口迁移的影响,晋语从官话中脱离以后,既有自身的演变又有晚期普通话文读层的进入,通过对早期层次“存古性”与晚期层次“创新性”的研究,借助层次离析法,结合汉语方言的音韵文献,兼顾历史演变,论证共时音系中共存的官话与晋语两个不同来源的音韵层次,证实了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的结论。乔全生(2016)《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四)讨论了晋语上党片、吕梁片和五台片咸山摄细音字超前演变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咸山摄鼻音韵尾脱落,变为开元音[i],进而促使语音系统调整,出现元音高化等现象,如:上党片武乡方言中“鞭[pei113]、件[tsei55]、宣[suei113]、渊[zuei113]”等;吕梁片柳林方言中“沾[tsei24]、甜[thie33]、眼[nie412]”等;五台片枣林坪方言中“钳[tchie33]、染[zɿei312]、县[ɕie53]”等^[29]。具体情况见表4、表5、表6、表7:

表4 上党片武乡、襄垣咸摄细音字的读音状况

	咸	减	贬	尖	钳	敛	兼	嫌
	咸开二 平咸匣	咸开二 上赚见	咸开三 上赚帮	咸开三 平盐精	咸开三 平盐群	咸开三 上赚来	咸开四 平添见	咸开四 平添匣
武乡	sei33	tsei213	pei213	tsei113	tshai33	lei213	tsei113	sei33
襄垣	ɕie11	tɕie213	pei213	tɕie33	tɕhie11	lei213	tɕie33	ɕie11

表5 上党片武乡、襄垣山摄细音字的读音状况

	艰	颜	棉	仙	全	冤	选	典
	山开二 平山见	山开二 平删疑	山开三 平仙明	山开三 平仙心	山合三 平仙从	山合三 平元影	山合三 上猕心	山开四 上铣端
武乡	tsei113	zei33	mei33	sei113	tshuei33	zuei113	suei213	tei213
襄垣	tɕie33	iei11	mei11	ɕie33	tɕhyei11	yei33	ɕyei213	tei213

表4、表5显示,上党片武乡、襄垣方言咸山摄鼻音韵尾合并之后,其细音字均丢失鼻音韵尾转变为开元音[i],且咸山摄见系二等字也随三四等同步发生了演变。其中,武乡方言精见组细音字丢失[i]介音,仍保留舌尖前音[tʂ tʂh s];襄垣方言的演变较武乡方言快,精见组细音字声母已发生腭化,保留[i]介音,读舌面前音[tɕ tɕh ɕ]。乔全生(2016)将武乡、襄垣方言咸山摄细音字的这种变化机制称为“隔音同化”,“即舌尖鼻音韵尾n受介音i或y的影响变成i”^[29]。

表6 吕梁片柳林、五台片枣林坪

咸摄细音字的读音状况

	蚕	站	碱	钳	沾	染	甜	嫌
	咸开一 平覃从	咸开二 去陷知	咸开二 上赚见	咸开三 平盐群	咸开三 平盐知	咸开三 上琰日	咸开四 平添定	咸开四 平添匣
柳林	tʂhæ55	tʂæ53	tɕie412	tɕhie55	tsei24	zei412	thie33	ɕie33
枣林坪	tʂhæ33	tʂæ53	tɕie312	tɕhie33	——	zɿei312	thie33	ɕie33

表7 吕梁片柳林、五台片枣林坪山摄细音字的读音状况

	蛋	眼	仙	扇	短	关	传	县
	山开一 去翰定	山开二 上产疑	山开三 平仙心	山开三 去线书	山合一 上缓端	山合二 平删见	山合三 平仙澄	山合四 去霰匣
柳林	tæ53	nie412	nie24	sei53	tuei412	kuæ24	tshuei55	ɕie53
枣林坪	tæ53	ie312	ie24	ɕiei53 / sɛi53	tuɿ312	kuæ24	tshuæɿ33	ɕie53

表6、表7显示,吕梁片柳林、五台片枣林坪咸山摄细音字也丢失鼻音韵尾,演变为开元音。其中,乔全生(2016)认为,知系字受声母的影响,丢失[i]介音;精见组“鼻音韵尾*n变为i之后由于受到介音i的异化而脱落,故而三四等非知系字均读为i(y)e韵母”。晋语咸山摄舒声字丢失鼻音韵尾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我们把上党片武乡、襄垣,吕梁片柳林,五台片枣林坪由*n>i的现象称之为“鼻音韵尾i的去鼻化现象”^[29],且这种“去鼻化”是一种很晚近的现象,它发生在咸山摄鼻音韵尾合并之后,包括三四等细音字和二等见系字。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是对晋方言语音用同片相比、跨片相类的方法考察后得出的结果。

总之,迄今为止,山西方言语音研究调查点的数量已覆盖山西总县市的75%左右,跃居全国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前列。晋方言语音研究的具体实践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充分证明:晋方言语音研究不仅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关键的文献依据、重要而难得的音变线索,而且印证了语音史研究的方法论依据。

参考文献:

- [1] 乔全生,周怡帆. 论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14-19.
- [2] 钱乃荣. 上海语言发展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3] 乔全生.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 刘晓南. 宋代四川语音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5] 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6] 乔全生,余跃龙. 文水方言百年来的元音高化[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47-50.
- [7] 骨勒茂才. 番汉合时掌中珠[Z]. 木刻本. 1190.
- [8] 王临惠. 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9] (清)田万选. 芸香斋韵法新谱[Z]. 存世孤本. 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 [10] 侯精一,温端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 [11] 乔全生. 洪洞方言研究[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12]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13] 金有景. 襄垣方言效摄、蟹摄(一、二等韵)字的韵母读法[J]. 语文研究,1985(2):58-62.
- [14] 王利. 晋东南晋语语音研究[D]. 山东大学,2008.
- [15] 刘勋宁. 隰县方言古咸山宕三摄舒声字的韵尾[J]. 方言,1993(1):53-56.
- [16] 鲁冰,任晓静. 永济方言研究[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 [17] 曹志耘. 汉语方言中的调值分韵现象[J]. 中国语文,2009(2):141-148.
- [18] 支建刚. 豫北晋语中的异调分韵现象[J]. 中国语文,2013(3):273-288.
- [19] 马学良. 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20] 乔全生. 历史层次与方言史研究[J]. 汉语学报,2014(2):2-12.
- [21] 戴黎刚. 历史层次分析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J]. 当代语言学,2005(1):14-25.
- [22] 鲁国尧. 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和我的“结合论”[J]. 汉语学报,2007(2):2-10.
- [23] 王国维. 古史新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24] 鲁国尧. 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J].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亚非语言计算分析研究,1988(30):149-224.
- [25] 鲁国尧.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J]. 古汉语研究,2003(1):2-7.
- [26] 乔全生. 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一)[J]. 方言,2003(2):147-160.
- [27] 乔全生. 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二)[J]. 方言,2003(3):233-242.
- [28] 乔全生. 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三)——见组细音字的超前演变[J]. 汉语学报,2013(2):2-8.
- [29] 乔全生. 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四)——咸山摄细音字的超前演变[J]. 北斗语言学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92-100.

Re - exploration on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Phonetic Study of Jin Dialect in Chinese Phonology

QIAO Quan - sheng, LIU 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Gao Ben - han engaged in the phonetic study of Jin dialect.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it involves providing abundant phonetic materials for academic circle,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onetic history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digging out some details in the phonetic history of Northern Mandarin. They are also enriched by this article with the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phonetic study of Jin dialect in Chinese phonology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practice in the study of phonetic history of Jin dialect provides a number of key literature bas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Secondly, the study of phonetic history of Jin dialect provides important phonetic change cu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Thirdly, the study of phonetic history of Jin dialect provides valuable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and Chinese phonetic history.

Key words: Jin dialect; phonetic research; Chinese phonology; new double evidence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郭庆华)